
日本学术视野下的浙江研究—— 基于日本 KAKEN 数据库分析¹

刘岩, 王晓梅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海外浙江研究是“浙学”成为世界“显学”的重要内容,但对海外研究浙江的史料挖掘与文献梳理尚未引起关注。立足于海外视阈下中国区域研究的学术立场,整理并分析日本 KAKEN 数据库收录的有关浙江省研究的立项课题,呈现了立项趋势、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研究种类等方面的整体貌相,对宏观层面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域外交流与合作、民俗及方言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杭州诗人活动的历时考察、宁波与域外的历史交流、温州商人的 interpersonal 社会功能、绍兴的地方文化与人物挖掘、舟山市传统民间艺术之木偶戏、金华地区的口头传承文化《金华道情》等相关课题研究成果进行译介述评,旨在厘清与把握日本浙江研究学术史料,弥补“浙学”研究阙如,从而有助于以全球化视角更好地塑造立体的中国区域形象。

【关键词】日本; 浙江省; 内容述评; 学术特征; KAKEN 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在中国形象的海外构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应借鉴他者镜像下对中国的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成果,以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认知。因此,以中国区域研究为重心的海外研究是实现中国形象的海外构筑与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的一环。国内学者一直重视收集、整理与翻译日本学者对中国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文献。张正军^[1]聚焦于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呈现了日本学者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民族民间文学方面的学术观点。王晓梅^[2]系统整理、译介与述评了 20 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谱系。立足于海外关于中国某一区域研究方面,刘岩等^[3-4]利用日本 KAKEN 数据库,宏观呈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对云南、贵州研究的全貌。龚群辉^[5]基于 EMERALD 数据库,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呈现了海外学术视野下的浙江印象。

如上所述,海外学者中国区域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而日本学界对于浙江省的多维度研究却尚未受到重视。浙江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加之其便利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省份。据何杨鸣^[6]考证《农学报》与《浙江潮》可知,浙江是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为各省之首。早期的赴日浙籍留学生一方面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引起了日本对浙江的兴趣与认知。据笔者所查阅资料,近代日本涉及浙江研究的文献可以追溯至 1882 年由小泉正保^[7]所撰写收录于东京地学协会会刊《东京地学协会报告》的“清朝浙江纪行”。因此,有必要通过厘清与把握日本对浙江区域研究的史料文献与学术成果,为我国“浙学”研究提供海外他者的研究史料,以期弥补国内学者“浙学”研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阙如,同时有助于以全球化视角更好地塑造立体的中国区域形象。

¹收稿日期:2020-07-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SS001)

作者简介:刘岩(1985-),男,吉林松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海外中国学方面的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 KAKEN（以下简称“KAKEN 数据库”），KAKEN 数据库是由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和国会图书馆在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协助下建立的。该国家级数据库收录的受资助的科研项目立项范围极为广泛，自然科学及人文社科等各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均可申请，主要采用同行评审方式，优先资助具有杰出的、独创性、先驱性的研究项目，收录有立项课题、研究人员、成果报告书、发表论文等详细信息，涵盖 1965 年以来所有资助课题的信息。

（二）数据筛选

笔者以 KAKEN 数据库公布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为检索对象，收集数据时发现，日本除了以“浙江”为区域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以浙江省地级市为区域进行调查与研究。首先，检索 1965 年至 2019 年的科研项目题目中含有“浙江”的科研项目。其次，分别以“杭州”“绍兴”“温州”等 11 个地级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再次，对地方名称的旧称进行确认与检索，譬如与绍兴旧称“会稽”相关的课题“东晋南朝时期会稽贵族消亡的历史研究及其画像整理”，亦将此类课题纳入研究范围。最后，合并重复课题，剔除表示“历史”而非表示“区域”的课题。例如“建炎、绍兴年间的政治过程和南宋高宗朝权力的构造”课题中虽然出现“绍兴”，但表示的是宋高宗年号，而非浙江省地级市，因此剔除。

基于上述筛选与统计关于浙江省研究的有效课题共计 72 项，除宏观上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以外，微观上还涉及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舟山市、金华市 6 个城市。

二、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的整体貌相呈现

（一）立项趋势

图 1 呈现了 1966 年至 2019 年间日本关于浙江科研课题立项年度趋势。如图 1 所示，日本以科研项目研究浙江始于 1966 年，可以说起步较早。1966 年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立项较少，课题数为 19 项，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十年间，课题数有所下降，为 12 项。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关于浙江研究的立项课题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只有 7 项。进入 21 世纪，日本对浙江的研究有所回升，科研项目总数达到了 34 项，约占总课题数的 47.2%，其中 2005 年立项课题高达 12 项。从立项年份上看，呈断点式分布。整体而言，日本对浙江研究立项课题数量随年份略波动起伏，但立项年份与立项数量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为 0.2208，总体呈正相关增长，可以说日本学界对浙江研究持续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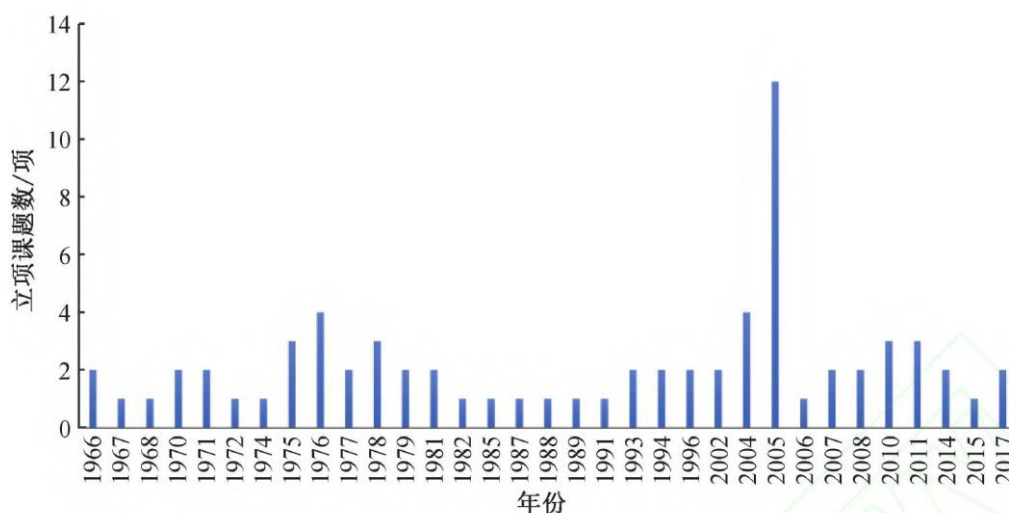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关于浙江研究科研课题立项趋势

（二）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

日本从 1966 年开始通过国家级立项课题开展对浙江的研究。笔者对课题立项单位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日本在浙江研究方面的研究机构以爱媛大学和九州大学居首位,是日本研究浙江的核心研究机构,累计项目均达到了 5 项以上;其后是九州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大学 3 所帝国大学及信州大学、静冈大学、香川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法政大学,立项课题数量均在 2 项以上,最后是东京学艺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兵庫教育大学等的科研项目有 1 项。而日本在浙江研究方面的学术群体中也出现了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的专家,例如:福山平成大学市濑信子(4 项)、大阪大学斯波羲信(3 项)、信州大学早坂俊广(3 项)、爱媛大学仓冈唯行(3 项)、东京大学小岛毅(2 项)、追手门学院大学松家裕子(2 项)等学者。

（三）研究种类

通过统计发现,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种类有一般研究、基础研究与特定领域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一般研究,有 21 项,基础研究、特定领域研究紧随其后,分别为 16 项、12 项,三者总数占据总课题数的 70%。“一般研究”名称在 1996 年改为“基础研究”,该研究由日本学术振兴会主管,致力于有独创性、前沿性的研究。与之相对,特定领域研究由文部科学省主管,旨在促进日本国内学术水平提升、需要国际间合作、或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研究^[8]。

另外,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研究种类还有实验研究、奖励研究、国际研究、青年研究、综合研究、重点领域研究、特别研究员奖励研究、研究活动启动支援研究。整体而言,日本关于浙江研究课题的研究种类几乎涵盖了日本国家科学研究费的所有种类,但也呈现了在研究种类的倾斜与不平衡的倾向。

三、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的

内容述评

与笔者此前撰写的日本关于云南省、贵州省立项课题中的内容相比而言,日本关于浙江立项课题“浙江省/市+焦点内容”的特征十分显著,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浙江研究尽管立足于浙江的文化挖掘,但也呈现了显著的地方性特征。

（一）浙江省

日本学者对浙江省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在历史文化、域外交流与合作、民俗研究及方言研究 4 个方面。

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分别为大阪大学斯波义信“宋元时期浙江地区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研究”^[9]、爱知学院大学铃木哲雄“唐五代时期浙江禅宗研究”^[10]及关西大学藤善真澄“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与日本”^[11]。在探讨“中日关系史上的浙江与日本”的研究中分别以“佛僧往来”“江戸时代的日中关系”“汉籍与和书的相互交流”“浙江人的日本留学和中国近代文化”为主题开展研究，发表论著 10 余篇。日本文化中的诸多要素都源于吴越地区，其中对日本影响深远的禅宗，究其源头都来自于浙江、福建一带。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的中日交流史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且尤其注重考察禅学之东渐。

在域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课题有九州大学川胜贤亮^[12]与新居滨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鹿毛敏夫尚^[13]共同主持的“关于中国浙江省战国大名沉船的日中共同研究”。通过对中国文献史料记载的查阅，证实了嘉靖 36 年（1557 年）日本战国大名大友义镇派往浙江的贸易船在舟山岛岑港沉没这一史实，确认了与沉船时代相关的考古遗物，并明确了船舶母港的城市空间构造。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共同研究的重要性。

从民俗研究的视角探知浙江的历史文化、居民生活文化等亦是日本学者展开其研究的重要视角。在涉及浙江民俗信仰方面主要涉及道教、民俗信仰，庙宇、祭神的礼仪，民间戏剧复兴，农村口承文艺，劝善·免灾口头文艺等内容。二阶堂善弘^[14]主要对浙江、江苏一带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庙宇、祭神、礼仪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从国际比较视野的角度，探讨了日本禅宗寺院祭祀的伽蓝神与中国浙江、江苏一带庙里祭祀的关系，指出“从镰仓到室町时期，伽蓝神从中国传入，至今在建长寺、寿福寺、相国寺、东福寺、建仁寺、永平寺、泉涌寺等地仍供奉着这座雕像。招宝七郎大权、祠山张大帝、感召使者、掌帐判官等神明是道教或当时的民间信仰之神被引入禅宗的”。磯部祐子^[15-16]通过对浙江省民间戏剧复兴情况及其背景的调查，阐明了过去村民发挥核心作用的社庙戏剧，经过“文化大革命”（打破四旧）、改革开放后的变迁过程，以及民间戏剧重建的文学史意义。同时根据戏剧复兴的调查，分析了民间的文艺动向、宗教观、人生观、娱乐观等内容。桥谷英子^[17]以浙江说唱文艺为研究核心，以劝善·免灾的功能为焦点内容，对具有宗教礼仪性质的鼓词剧目《灵经大传》与《地域巡礼》进行了参与观察与文献研究，并结合说唱艺能文本《宝卷》的内容，明确了以女性血的污秽—“罪”为中心的演出过程中呈现的“劝善”和“免灾”的表现形式。

吴越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最早输入日本的汉语为吴语，至今吴音在日语汉字音读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日本国内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中，作为日语源头之一的吴语一直被视为研究的重点。爱媛大学 Ballard 教授^[18-19]一直致力于浙江吴语方言研究，主要以约 2000 种方言为对象，对其中 4 种方言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角度涉及声调、词汇及运用机械化手段分析声调交替，借助音调分析仪明确了浙江省中部及南部吴语方言有 27 种下位方言，结合频率、音长等数据统计，获得了各种关于声调和连续调制的新见解。另外他还指出通过良好的机械化装置可以观测男女在同一方言上的共性与差异性。

除上述课题以外，日本对浙江省的研究课题还涉及到山村集落调查^[20]、世界遗产^[21]、茶文化研究^[22]、民间企业调查^[23]等领域，呈现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二）杭州市

日本学者对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主要聚焦在清朝时期杭州历史人物的挖掘与史料整理。日本关于浙江的研究涉及清朝时期杭州历史人物挖掘的课题共计 4 项，均是由福山平成大学市濑信子主持，分别为“乾隆初期杭州诗人集团研究”（2008—2010 年）、“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活动与诗风研究”（2011—2013 年）、“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移动的变质与展开”（2014—2016 年）、“清朝康乾年间杭州诗人的诗会活动与地方文献编撰研究”（2017—2019 年），课题立项时间与完成时间呈现了连续性，

反映出日本学者对康乾时期杭州诗人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挖掘。

市濂信子在“乾隆初期杭州诗人集团研究”中,以杭州诗人流向各地的诗会活动为焦点,对活动的实际情况和诗作考察发现,“《韩江雅集》是扬州韩江诗社的唱和集,包含许多杭州诗人的作品,是反映杭州诗坛活动的作品集。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全祖望作为杭州诗坛的一员,游览各地藏书,运用丰富的知识储备补充史实,编写诗作诗集。^[24]市濂信子在“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活动与诗风研究”中指出,“在文坛上曾经毫无名气的天津地区,聚集在查氏水西庄的杭州诗人们,以诗歌为中心,参加地方杂志的编写、歌咏天津的诗的制作、各种编写事业,为天津文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实际情况。”^[25]另外,市濂信子比较了杭州诗人参加的扬州诗坛的唱和集《韩江雅集》和天津的《沽上题襟集》,论述了其内容与浙派诗风的关联。市濂信子的“乾隆时期杭州诗人集团移动的变质与展开机建课题的主要成果集中在:a)雍正初期杭州诗人集团因编写《南宋杂事诗》而名声鹊起,之后受到其他地方的诗坛邀请,展开了诗坛间的互动。b)查证了乾隆初期返回到杭州的诗人们召开诗会所呈现的诗风与浙派的诗风不同。关于诗风变化的理由,市濂信子推测“杭州诗人同各地诗坛开展互动之时,地方志编写正处于繁盛时期,特别是关于‘诗’的记录显著增加,有可能是因为地方文献的记录使浙派的诗风发生了变化”。市濂信子在“清朝康乾年间杭州诗人的诗会活动与地方文献编撰研究”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点内容:a)总结了关于《月泉吟社诗》的记录变迁。该诗集在不同的时代记录方式有所不同。明朝的记录侧重于宋遗民征诗活动,而清朝将重点放在了记录入选诗人,变化的契机是康熙年间的《御选宋金元明诗》;b)杭州诗人所作的《南宋杂事诗》全貌式记录了《月泉吟社诗》中的诗句及作者;c)在杭州厉鹗的《宋诗纪事》中,不仅记录了所有诗句及其作者的详细传记,还记录了《月泉吟社诗》诗集以外的诗集,此书也成为撰写地方杂志和历史资料的重要参考^[27]。市濂信子随后对杭州诗人较多、召开诗会的扬州进行了调查,以上述研究均把焦点集中在“宁波”研究上,注重阮元编撰的扬州诗坛纪录《广陵诗事》为中心,对诗社和诗会的记录进行调查,发现“此书是以诗人的记录为中心,记载了扬州诗坛现状的书籍,以地方为单位,通过诗歌叙事的格律阐述了清朝的时代特征。其中诗会正是地方诗坛兴盛的证明。”

该系列项目均以康乾时期的杭州诗人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既有从微观入手,对这一地域诗歌群体的诗学理念、诗会活动、创作成果加以分析,也有从宏观入手,共时性地考察了杭州诗坛与其他地域诗坛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以及对其他诗坛诗风产生的影响。日本学者市濂信子以“康乾时期杭州诗人”为核心的论述,无疑对浙江省优秀历史人物的挖掘、海外传播、文化交流、地方史、地域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特别是市濂信子建立在历史文献、档案材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客观准确、研究视角独特的论述与分析,为我国学者展开对“康乾时期杭州诗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文献与思考角度。

此外,藤井惠介^[28]通过对《大宋诸山图》研究,以及对中国古建筑群的现场调查,指出“中国城市史的变迁是由‘农业与游牧’地带相连的内陆都市网向与沿海地带相连的城市网转换”。

(三) 宁波市

日本对宁波的研究较为多元,研究领域聚焦在历史文化交流方面,同时还囊括了绘画人物、中国科举与宁波人士、清朝时期的宁波精神、学术传统以及自然领域的研究。日本以宁波为核心研究区域的课题始于1982年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29]的“宁绍(宁波·绍兴)地域社会组织研究”。从课题题目可知早期日本宁波研究是将其与绍兴作为整体的研究。

在历史文化交流方面,东京大学小岛毅^[30]以东亚海域的人物的交流历史为研究内容,从中国大陆面临东海的核心港口城市宁波为切入点,考察了日本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岛乐章^[31]以日宋·日元间渡航僧人的传记史料的调查、收集、整理为基础,编撰出版了《日宋·日元间渡航僧传记》,同时收集与整理了有关日明关系史的研究文献,并编辑出版了《日明关系研究文献目录》。森平雅彦^[32]围绕中近世(10—19世纪)的朝鲜半岛与东亚诸地域的海上交流的状态,详细考察了人物在海上往来的活动。伊藤幸司^[33]通过对宁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献的考察,明确了15—16世纪日本通过宁波吸收大陆文化的具体内容、日本人在宁波及其周边地区的具体活动地点。

上述研究均把焦点集中在“宁波”研究上,注重对宁波区域文化挖掘,同时与日本文化加以联系考察,足以说明宁波在整

个中日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将研究视野放在整个“东亚”这一广阔的空间中,突破中国本土的框架,对宁波在中日海上交流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加以考察。

(四) 温州市

以温州为研究区域的科研课题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涉及到温州蜜柑、温州商人、民族调查、灾害防治的研究。

据史书记载,温州栽培蜜柑已有 2400 多年历史。至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蜜柑引入日本。1965-1993 年关于温州的科研课题有 27 项,均为自然领域下对温州蜜柑的研究,涉及水分保持、持续经营、养分储存、花期调节、管理运营、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等内容,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日本对温州蜜柑的关注体现了浙江温州优秀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物产在海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同时也表现了浙江温州蜜柑海外传播本土化的过程。

山梨学院大学留日学者张华^[34]考察了温州商人的 interpersonal 网络的社会功能。课题组先后于 2011 年 3 月及 2011 年 5 月对温州和北京的温州商人进行调查;2011 年 8 月又以温州的 500 名商店店主为对象,进行了有关温州商人的 interpersonal 网络的问卷调查;2012 年 3 月再次对北京和温州的商人进行了定性调查。经过以上研究调查发现,在温州商人的市场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店铺的运营、资金的周转以及信赖关系的构筑。此外,根据商人的经营规模与事业志向的差异,人际关系网络也不同。此课题明确了温州商人的 interpersonal 网络的多样性,对于研究温州商人的商业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以外,福田亚细男^[35]历时三年对中国浙江省温州丽水地区的农耕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了村落构造与宗族的关系、传统家畜饲养的民俗、寺庙存在形态及其祭祀的具体层次,同时收集与整理了较难获取的各村落宗族的族谱及文字资料,这些珍贵文献对后续浙江民俗乃至江南地区民俗的研究大有裨益。河田惠昭^[36]分析了 1994 年东海岸温州附近登陆的 17 号台风带来的灾害影响,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他指出此次产生巨大灾害影响的原因主要有:a) 台风规模较大且风力较强;b) 台风登陆和大潮重叠发生高潮;c) 创纪录的暴雨;d) 天气预报不够准确。

(五) 绍兴市

信州大学早坂俊广致力于研究清朝后期绍兴地方思想文化。2002 年 9 月,为把握该地域的文化整体构造,早坂俊广对绍兴、杭州、宁波进行了多点式、大范围的实地考察,体验了赵之谦庭院遗迹及纪念馆,收集了相关资料,参观了蔡元培纪念馆并了解到其刊发了读书笔记,调查马一浮先生的故乡上虞市,并对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了认识,参观了杭州市“马一浮纪念馆”,对马一浮学术生涯的有所了解。通过上述的详细调查、收集与细致把握,早坂俊广发表了论文《黄震〈浙学〉:现实与表象的夹缝》^[37],文中指出:通过对宋代浙东地区的思想动向及其清代思想家的考察,可以为“清代后期绍兴”的后续研究积累基础资料。早坂俊广也十分关注马一浮思想资料的翻译工作,通过校注与翻译,指出了马一浮和其家乡先贤章学诚思想上的异同。另外,早坂俊广整理了与宋明思想相关的文献史料,以期呈现宋代以后思想史的脉络,发表《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译注》^[38]和《宋明思想研究现状与课题:中国——社会与文化》^[39]等论著。

佐藤正光^[40]基于《宋元方志畿刊》《元和郡县图志》《方輶胜览》《嘉庆重修一统志》《会稽志》《绍兴府志》等地方志及历史文献的考证,并结合《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词典浙江省》《浙江省地图册》等图文信息,创作了《晋宋年间名士与浙江省地名的关系图表》,研究中指出,“会稽地区是历史文化发达的地区,虽然南迁的东晋贵族在与先住民贵族的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受到宗教风土及胜地的影响,生活中形成了具有山水游行、道教信仰、山水诗创造等特征。”

(六) 舟山市

浙江省舟山市的木偶戏及口头传承文化是日本学者研究舟山市历史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桥谷英子^[41]2006—2008 年考察了

舟山市定海县（今定海区）的布袋木偶戏，对其进行了录制及表演内容的文本书写。2011—2013 年再次对浙江省泰顺与舟山布袋木偶戏进行实地考察，对《月唐演义》《粉妆楼》《胡奎卖人头》《月唐演义》《李白出考》进行了影视化录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偶动作细腻是上演的重要因素。人偶是辅助作用，叙述则是主要的，人偶与讲史的关系较为清晰。”

（七）金华市

追手门学院大学松家裕子^[42]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世以来的口头传承文化，以期深化理解中国文化史。在“浙江金华口承文艺研究：以《金华道情》为中心”的研究中，松家裕子以宝卷为中心，通过参与观察、与艺能者交谈和文本翻译等方法，细致地把握了口头传承文化《金华道情》的情况，研究发现，“艺能者的传承与演出能够让我们跨越文字这一过滤器，清晰地看到中国基层文化的特征。”此外，松家裕子对本宝卷和浙江蚕歌给予了高度关注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相继在日本道教学会、Court Theater and Court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中国文学会、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学会发表论文，特别是《浙江金华口头传承艺术研究——以说唱艺能〈金华道情〉为中心》^[43]一书的出版，无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浙江省优秀历史文化的海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日本对中国浙江研究演进的

学术特征

本文以 KAKEN 数据库所收录的关于中国浙江省的科研项目为分析对象，呈现了日本浙江研究的整体貌相与区域特征，发现日本在广泛涉及与深入挖掘浙江省历史文化与区域资源之时表现以下较为明显的学术特征。

（一）研究领域多维度

以日本研究浙江科研立项课题的学科归属为依据，日本对浙江的研究涉及到中国文学、经济政策、日本史、社会文化、基础工学、建筑意匠、国际交流、印度佛学、东洋史、语言学、亚洲史、艺术学史、经济史、人文地理、农业环境等领域。进一步而言，日本在自然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对温州蜜柑的考察，研究对象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多样化；与之相对，人文领域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视角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二）研究领域深入化

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人物的交往与流动使文化传播具有跨区域特征，立足于某一领域深入挖掘是日本研究浙江的重要视角。与自然领域相比，日本对浙江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人文领域，进一步细致划分则主要集中在国际视域下的海外交流、历史视阈下的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以人物为核心的对杭州诗人、马一浮、黄震等历史人物的史料挖掘与收集整理，以及对佛教典籍与说唱文本典籍的翻译解读与记录保存、立足于实地考察的综合研究等领域。

（三）立足区域特色挖掘度及日本对浙江省历史文化等领域的挖掘程度远远

日本对浙江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与考察，并紧密结合区域特色，挖掘地方史料、民俗文化。具体而言，无论是宏观上的对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域外交流与合作、民俗研究及方言研究，还是微观层面对杭州诗人活动的历时考察、宁波与域外的历史文化交流、温州商人的人际网络的社会功能、绍兴的地方文化与人物挖掘（马一浮）、舟山市传统民间艺术之木偶戏、金华地区的口头传承文化《金华道情》等一系列研究，无不完全展现了日本立足区域特色进行挖掘，并对相关珍贵文献及民俗进行收集、记录，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四)稳定的科研机构与核心人物

日本对浙江研究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一些核心的、稳定的科研机构,如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3所帝国大学及爱媛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学艺大学、法政大学、福山平成大学、追手门学院大学,同时形成了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的核心人物,如以杭州诗人研究为焦点的市川赖信子、以宁绍地区文化与域外交流为研究重点的早坂俊广与小岛毅、致力于浙江说唱文化的松家裕子、以浙江方言为研究中心的Ballard等。由于拥有稳定的科研机构与立足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可以预见日本对浙江研究的多领域、多层面的深入程度与学术成果。

(五)留日学者与中日学者合作交流

日本以科研立项课题对浙江开展系统研究已60多年,在这一历程中,除了日本学者以外,留日学者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或者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项目,或者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课题研究。同时,日本学者积极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可以说留日学者与中日学者合作是日本顺利开展浙江研究的重要条件。留日学者及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交流合作的方式,一方面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广泛交流与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浙江省优秀历史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助力。

五、结语

借助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浙江省研究与微观层面的区域研究,呈现了日本以科研项目研究中国浙江的整体貌相与相关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了日本浙江研究的学术特征。截至目前,日本对浙江研究较为活跃态,科研机构与学术群体趋于稳定,研究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丰硕程超乎想象。在当今立足于挖掘与传播浙江省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浙学研究不仅要立足于国内学者,更要放眼于百年以来海外学者对浙学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成果虽然可以管窥日本研究浙江的整体貌相,却未能呈现研究成果的细致,仅仅立足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的挖掘,尚未对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浙江论著、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对浙江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收集、整理、分类与研究。如何打破语言、学科、领域的瓶颈,着眼于日本的同时,关注英语世界关于浙学表述文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为国内学者浙学研究提供海外他者视阙下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成果的翻译与述评亦可以与国内浙学研究成果互证互补,弥补历时以来浙学研究的阙如,从这一点来讲,系统整理海外涉及浙江表述的研究文献是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是符合时代需要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张正军.文化寻根:日本学者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王晓梅.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

[3]刘岩,王晓梅,何薇.日本学者中国云南研究的内容焦点与趋势特征:基于日本KAKEN数据库分析[J].民族论坛,2019(4):74-80.

[4]刘岩,王晓梅,李哲.日本学者贵州研究课题的内容焦点与学术特征[J].艺术科技,2020,33(9):7-11.

[5]龚群辉.基于Emerald数据库的海外学术视野下的浙江印象[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5):78-82.

[6]何扬鸣.论浙江留日学生[J].浙江学刊,1998(3):3-5.

-
- [7]東京地学協会. 東京地学協会報告 6[R]. 東京:東京地学 協会出版社, 1884.
- [8]楊絮, 李哲, 王以宁, 日本教育技術國家級課題項目熱點研究[J]. 現代教育技術, 2017, 27(10)=6.
- [9]斯波義信・宋元時代浙江地域の經濟史的・歴史地理学 的研究[R]. 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 1974.
- [10]鈴木哲雄. 浙江の禪宗に関する資料一唐代・五代[J]. 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 1975(5) :63-101.
- [11]藤善真澄. 入唐僧と杭州・越州[J].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 1996(29) :37-56.
- [12]川勝賢亮・明清時代、商品生産の展開と江南市鎮の形成[J]. 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 1997(25) = 1-52.
- [13]鹿毛敏夫. 戰國大名領國の國際性と海洋性[J]. 史學研究, 2010(260) :1-17.
- [14]二階堂善弘. 民間信仰における神形象の変化について一華光大帝と招寶七郎を例に [J].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創刊号, 2009:179-186.
- [15]磯部祐子・中國民間演劇の現状一紹興の蓮花落・鸚哥 班・宝卷を中心として [J]. 高岡短期大學紀要, 2008(20) :221-234.
- [16]磯部祐子. 浙江における灘簧系演劇の再興[J]. 富山大學人文学部紀要, 2006 (45) : 141-154.
- [17]橋谷英子. 中國の人形芝居[M]. 新潟:佐渡市教育委員會社會教育課佐渡學センター , 2013.
- [18]Ballard W L. 中部浙江の二つの吳方言にみられる声調と語彙の研究[R]. 愛媛:愛媛大學, 1988.
- [19]Ballard W L. 浙江省中南部吳方言の聲調交替に関する實驗音聲學的研究[R]. 愛媛:愛媛大學, 1989.
- [20]高村雅彦. 中國浙江省の山村集落と明代の住宅群に関する史的研究[R].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2003.
- [21]谷本親伯. 大阪大學敦煌莫高窟學術調查の概要[J]. 土と基礎, 2005, 53(3) :8-10.
- [22]高橋忠彦, 佐藤正光, 土屋裕史. 唐宋茶詩訳注(5)蘇軾「葉嘉伝」他二篇の訳注[J]. 茶の湯文化學, 2009(16): 100-134.
- [23]菊池道樹. 中國浙江省における民間企業に関する基礎調査[R]・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2010.
- [24]市瀬信子. 全祖望と唱和詩-杭州詩壇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一[J]. 福山平成大學紀要, 2010(7) : 21-48.
- [25]市瀬信子. 『沾上題襟集』と『韓江雅集』口]. 福山平成大學經營學部紀要, 2013(10) :15-32.
- [26]市瀬信子. 周京と杭州詩壇[J]. 中國中世文學研究, 2015(67) :39-61.
- [27]市瀬信子. 杭州地方文獻としての『西湖修禊詩』[J]. 中國中世文學研究, 2017(71) :1-21.

-
- [28] 藤井恵介. 杭州湾岸地域における都市・建築・歴史の構造[R]・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9] 斯波義信. 寧紹(寧波・紹興)地域社会組の分析: 宗へ清[R]. 大阪: 大阪大学出版会, 1982.
- [30] 小島義. 寧波の歴史文化についての学際的研究-東アジア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形成との関係[R].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1] 中島榮章. 封倭と通貢一五九四年の寧波開貢問題[J]. 東洋史研究, 2007, 66(2): 107-139.
- [32] 森平雅彦. 黒山島海域における宋使船の航路: 『高麗 図経』所載の事例から[J]. 朝鮮学報, 2009(212): P45.
- [33] 伊藤幸司. 外交と禅僧-東アジア通交圏における禅僧の役割一[J]. 中国. 社会と文化, 2009(24): 41-70.
- [34] 張華. 温州商人のビジネスモデルに関する考察[J]. 現代ビジネス研究, 2011(5): 33-42.
- [35] 福田アジア. 環東シナ海(東海)農耕文化の民俗学的研究-中国浙江省温州・麗水地区の民俗調査[M]. 神奈川: 神奈川大学出版会, 1998.
- [36] 河田恵昭. 1994年中国・温州における高潮氾濫・波浪災害に関する調査研究[R]. 京都: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1994.
- [37] 早坂俊廣. 黄震の「浙学」-現実と表象のはざままで[J]. 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論, 2003(37): 1-21.
- [38] 早坂俊廣. 馬一浮「泰和宜山会語」訳注(2)[J], 信州大学文学部人文科学論集, 2004(38) = 43-62.
- [39] 早坂俊廣. 「宋明思想」研究の現状と課題[J]. 中国社会と文化, 2004(19): 391-404.
- [40] 佐藤正光. 南朝の門閥貴族と文学[M]. 東京: 汲古書院, 1997.
- [41] 馬場英子. 舟山、人形芝居の「李三娘」またの名「白兔記」について[J]. 颯風, 2008(45)=41-54.
- [42] 松家裕子. 『惜穀宝巻』について-咸豊期一宝巻における文学と宗教一[J]. 桃の会論集, 2016(7): 59-104.
- [43] 松家裕子, 小南一郎, 磯部祐子, 等. 浙江金華口承文藝研究一語りもの藝能「金華道情」を中心に[M]. 大阪: 川西軽印刷(株), 2016.